

师哲回忆录——毛主席的婚事

康生安排江青照顾毛主席

1940年我从苏联刚回到延安不久,就听到一些同志们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议论。因为当初决定我还要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,康生、江青钻空子主动向我介绍一些情况,澄清事实,表现自己,希望我在共产国际方面为他们讲好话。

江青是1937年秋冬到延安的,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。

1937年11月29日康生夫妇随王明从苏联回来。回延安后,康生在组建中央社会部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,他的夫人曹轶欧担任中央党校干部处处长。

江青与康生同是山东诸城人。江青本姓李,家住在县城东门外,家境中下,生活不富裕。江青自幼聪慧,身材修长,面容姣好,是个窈窕淑女。父母把她送到城内东街南区的聊城小学读书。她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东街的张家。

张家是从股东迁来的富户,在东街买了一座四合院,坐西朝东,大门向东开。张家的第三代是康生。康生亲口对我讲过:江青每天上学从他家门前过,他是目迎目送。1957年我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,专程到诸城考察。陪我的县委书记主动介绍了江、康两家的情况。从县委书记介绍的情况看,江青上学是要经过康宅的门前。

上世纪20年代康进上海大学学习,结识了同学曹轶欧,由朋友结为夫妻。曹轶欧为人厉害。康生与江青到上海后没有什么来往。

江青十几岁时因家境困难外出学艺。后在上海,以蓝苹为名演戏、拍电影,参加进步活动,坐过牢。

康生先请江青到枣园玩,这是很特殊的。康生立了很严格的规定,未经许可,任何人从中央社会部的门口过都不行。不久,康生将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党校学习,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班,有江青、张茹之等五六个女同学。这个班直接由曹轶欧管。

康生让江青主动去找主席。没有康生指示,江青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没有康生安排,江青也无法进入主席的住地。

我回国不久,康生就同我讲:在中国要搞好社会关系,建立友谊,有两个法宝:一是教书,当教员,可以桃李满天下。中国人是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”,学生自然要拥护你,不像苏联人师生关系



1948年，在西柏坡。图中右起为毛泽东、师哲、米高扬、伊万·科瓦廖夫。

淡薄。二是当月下老,为他人介绍老婆。

江青告诉我,是康生找她谈话,说:主席一个人,生活上没有人照顾,你去关心关心。

此时,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已到西安、新疆,准备去苏联。主席做工作,贺子珍执意不回来。有人告诉她,别人抄了你的老家。她不管,仍要去苏联治病。

江青第一次到主席那儿,主席望望她说:“你对我能有什么帮助?”

“我可以管生活、家务。”
“你能负担得起吗?”主席又问。

“能,试试看。”说完,她就帮助主席打扫屋子,把桌面收拾干净、整齐。收拾床铺时,不仅将床单扫净,连褥子都扫净,重新铺了。这些事都是警卫员做的。警卫员都是来自农村的毛头小子,扫不了这么干净。

主席没有留她吃饭,她也比较拘谨,干完活就走了。

过了两三天,江青又去了,主席的屋子经过几天又乱了。她仔仔细细地打扫一番。之后,见主席衣服的胳膊肘破了,主动地说:“我给你缝缝。”这次主席说:走这么远的路。留她吃了饭,才走的。

当时主席住在北门外凤凰山麓的李家窑洞。中央党校在延安城东北五公里处桥儿沟镇。

不知从何时起,她就住下不走了。主席说:“不走了,好嘛,有地方住。”

当时主席住着三间石窑洞,左边是书报室,中间是会客室,右边是主席的办公室和寝室。

毛主席和江青结婚 没请张闻天

江青经常到主席那儿的消息很快传开了。大家议论纷纷,多有微词。中央党校的学员们集体签名给党中央写信,坚决反对主席与江青结婚。当时刘晓领导的上海市委亦打来电报反对此婚事。我记得王世英参加了签名。当时在党校学习的人不少都是从白区来的,知道江青的底细和为人。江青是演员,多次婚变发表于报端。而且她在狱中的表现,如何出狱的,引起人们的怀疑。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写了两次信,要求中央书记张闻天转给毛主席。

张闻天是留学生,受西方文化的影响,不干涉私人生活。中央党校的学生见写信不奏效,又派代表来见张闻天,说:这不是私人的事情。中国和西方的习俗不一样,在中国,领导人的婚姻必然影响到政治。一定要张闻天向主席转达大家的意见。不得已,张闻天挑了一封口气较缓和的信转交主席。主席是不认输的人,很生气,决定和江青正式结婚。

不久,由主席设宴,款待大家。连张鼎丞都请去了,唯独不请张闻天夫妇,就是因为张闻天转了那封信。

1940年江青在中央医院生了李讷。不久,她就将输卵管结扎了。金大夫为她做的手术。江青本姓李,因而女儿也随她姓李,名字也是江青起的。

1941年中直机关搬到杨家岭后,江青嫌人多嘈杂,1943年和

毛主席搬到枣园去住。

整风时期,江青在中央党校学习。主席把她交给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。当时主席兼着中央党校的校长。中央党校审查江青的历史,她的党籍都有问题了。因而她比较老实。到七大之后,她才有了组织鉴定。有了结论,她非常高兴,来找我。我是支部负责人。这样她才恢复组织生活。

她的生活习惯和主席的不一样,爱挑剔。在延安的时候,江青在政治上的表现还是拘谨克己,在公开场合不露面,不敢露峥嵘,顶多就是提出要买些东西。

如做皮衣,一定要买宁夏的滩羊羔羊皮。吃药,要从香港买。买山东的特产阿胶等等。当时国民党封锁我们,要办到这些事都比较困难。江青知道主席的全部心血、精力都用在考虑我党、国家的大事上,但为了达到她个人的目的,她故意干扰毛主席的工作。为了保证主席安心工作,我们不得不满足江青的一些不合理要求。为此任弼时批评我两次。

高岗陪江青出巡到绥德调查,有一段时间不在延安。我批评高岗:你把延安丢了,跑到哪里去了?他赶快讲了实话,说这是为了照顾主席,他才去的。他说:“我不能得罪她。”中央转战陕北时,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留在陕北。周恩来的夫人邓大姐、任弼时的夫人陈琼英,都到了河东后委,只有江青这位夫人留在陕北。她的职务是协理员,也做不了什么工作,还给机关添了不少麻烦。

转战陕北之后,她自认为有了政治资本。中央领导到香山后她去了一趟苏联,开国大典前回到北京。开国大典时,她想上天安门,毛主席不同意,她气得要死,但也无可奈何。

她后来逐渐越来越不像话。“文革”期间她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,政治局委员,飞黄腾达,不可一世,无法无天。不少当年反对她婚事的同志都受到迫害,这都是江青一手导演的,这个账应记在她的身上。

毛主席将事情想得简单了,没有想到江青会是这样。主席并不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情况。

毛主席对江青并不满意。从后来公布的材料来看,从1974年起,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多次。毛主席没有把权交给江青,从这点证明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伟大政治家。



《在历史巨人身边：师哲回忆录》(增订本)
师哲 口述
李海文 著
九州出版社
2015年2月出版

该书口述者师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八年,是延安整风、国共谈判、中苏关系、朝鲜战争等诸多重大史实的亲历见证者,曾与多位中共领袖人物密切交往,他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讲,是我们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所不可替代的珍贵史料。

该书曾于1991出版,此次九州版《师哲回忆录》首次增补了更多未曾披露过的历史内情,新增“主席的婚事”章节以及大量历史照片、中外人名对照表、大事记和索引。



《行在宽处》
冯仑 著
湖南人民出版社
2014年12月出版

中国商业圈地标式人物、企业家冯仑继畅销书《野蛮生长》后,推出又一新书《行在宽处》。作为一位具有责任、情怀与远见的企业家,冯仑集数十年思想沉淀,畅谈人生,以诙谐、麻辣的文字,解读当前的机遇与挑战,纵论企业管理、转型、应对危机之道。

在本书的序言中,冯仑指出《行在宽处》意义在于生命宽度的无限拓展,所谓向宽处行,事实上不是向大家都关注的进步去行,也不是向浮华、获取去行,而是学会退却、放下、懦弱、面对死亡,学会淡然、超然。

行在宽处——朋友需要人走茶凉

在人生的不同阶段,朋友和你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。比如,有些朋友本来和你关系挺好,但是,当你遇到困难或遭遇变故的时候,他们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对你好了。

我讲一个故事。早年我还在机关里的时候,单位给我配了一部车和一个司机。那个司机开始的时候挺热情,把我当朋友。后来我落魄了,有时候还坐那部车,他就不太高兴了,我还以为是他家出了什么事。有一次,他把我拉到政府门口,就把我赶下了车。他说你已经不是领导了,就应该在这儿下。我就在那儿下了,下车以后,我自己坐四毛钱的中巴回到宿舍。过了一些日子,我们发行股票,他来找我,说想买便宜的股票。我当时很撮火,想抽他一顿,但最后还是卖给他了。后来我想想,他这么做也有道理,他一个打工的,巴结领导是他的天职。你已经不是领导了,他还天天巴结你,那别的领导怎么看?而且,巴结一个不是领导的人有什么

价值呢?你已经不是领导了,还非得让人巴结,这就是你的不对了,我们得体谅别人。

我再讲一个故事。1989年,我因为遇到一些变故,要借几百块钱。结果,好人都不借给我钱,反而是大家通常认为的坏人借给我钱。所谓坏人,就是那些领导看不上眼的,不正经上班在外面办皮包公司折腾的人。当时,在政府机关里,这样的人都是坏人,经常被人举报。借给我钱的这个人,当时也有人举报他,因为我当时还在政府机关,所以准备处理他。结果,还没来得及处理,我自己也不行了。还有一个人,他是个非常规范的好人,我们也是朋友,而且是我把他招到单位的,什么都帮他安排得挺好。我去跟他借钱,他不借,他说我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没戏了。我没办法,结果正好碰上这个所谓的坏人,我就问他能不能帮我个忙。他说什么事,我说我想跟你借300块钱。他说行,你明天到我这儿来一趟。第二天,我就到他

那儿去了,去了以后,我跟他说,我还是打张借条吧。于是我打了张借条,借了300块钱,然后坐着火车从海南回北京。到了武汉火车站,有个我研究生毕业后代职下放到那家工厂的工人来接我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堆皱皱巴巴的钱,总共70块钱,说借给我。这都是属于当时谁都看不上的人。

回到北京,我就开始折腾。后来,我们万通慢慢做起来了。有一次,我打出租车,站在电线杆子底下,正好碰见那个借给我钱的人。他问我现在怎么样,我说还行吧。他说我觉得你一定能做起来。我说我什么时候把钱还给你。他说我不要,你千万别还,等你再发达一点儿的时候再还我,那时候我拿着你的借条,走到哪儿都可以去找你。这人挺有意思的,学导演的。后来他真的遇到了一些坎坷,坐了牢。出来以后,有一次,他打电话给我,说他现在真得找我了,让我帮他。我就给了他一些帮助,但那300块钱我还是没还给他。

所以,你需要直面人生。第一,你得有心理准备,在你困难的时候,主流价值观所认为的那些好人不一定仍然能像以前一样对你好。第二,你得理解,当别人不帮你的时候,你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很多人说现在世态炎凉,领导干部一退,就人走茶凉。你人都走了,还老要让茶热着,人家群众怎么巴结后面的领导啊?前面的茶老不凉,我一个群众得巴结200个领导,还让不让群众活啊?但是,茶凉并不等于不尊重,如果你回到这里,我再临时给你沏杯新茶,但我不会让茶一直热着。所以,你得宽容,得理解,这样大家在这个社会上才能找到各自生存的道路。

我经常说,不要巴结领导,要巴结群众。群众多啊,一人给你一口你就能活。领导少啊,领导都怕事,他不罩着你也有道理,何必为难领导呢?巴结群众,你就成为特殊群众,你群众素质高,最终就可以领导群众。所以,有句话叫做“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”。